



复旦文史专刊之七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复旦文史专刊之七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3.6

(复旦文史专刊)

ISBN 978-7-101-09304-9

I.佛… II.复… III.佛教史-研究方法 IV.B94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089 号

书 名 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执行编者 刘 震

丛 书 名 复旦文史专刊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frac{3}{4}$ 插页 2 字数 37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304-9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2008年中国大陆佛教研究方法论讨论·····	黄夏年 (1)
护法与镇墓:唐陵礼仪空间中的石狮·····	李星明 (18)
德国佛教艺术史研究方法举隅:以九色鹿故事为例·····	刘 震 (36)
叙事、隐喻与象征:中国佛教中的动物·····	陈怀宇 (56)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	
——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	沈卫荣 安海燕 (69)
在佛教研究之边界上	
——东亚佛教研究中概念和方法论的转型·····	罗柏松 (89)
汉语学界唯识学研究一甲子回顾:1949—2011年·····	刘宇光 (110)
日本的禅学研究和禅宗思想史的课题·····	土屋太祐 (178)
隋及唐初的亲王与地方僧团之关系·····	孙英刚 (188)
会议讨论·····	(201)

2008年中国大陆佛教研究方法讨论之我见

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研究宗教所发表的成果是,书籍约3000本,发表文章约20000篇(现在大陆每年出版宗教类书籍约300本以上,发表论文3000篇左右),这些数量庞大的成果,可以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在宗教学研究方面的繁荣情况,同时这也显示宗教学研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众多的学术成果面前,我们要更加冷静地看到当前宗教研究所缺少的变化与存在的问题,而宗教学基础理论性的研究工作,即要从学理性对宗教的本质和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或模式,在未来的世界宗教学中独树一帜。这部分研究的范围很广,内容繁杂,涉及了多个学科,参与者众多。

一 宗教研究方法论的回顾

学术研究最重要、最基础的是方法论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宗教,让宗教研究取得最有效的成果,是当前宗教学界要面对的一个首要任务。我国的近代学术研究是在受到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之后建立起来的,其方法论的建立与使用,一直没有脱离西方的语境与影响,换言之,我们的研究成果仍然是在西方学术界的方法论的影响下而得出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宗教在我国一直存在,并且呈现了多种形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流行信仰多种

宗教的群体。因此研究宗教的方法,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而进行专门的针对性研究,否则还是跟在别人后面学舌,永远不能走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列。

研究历史与哲学的人,都熟悉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中国研究学问的特色。所谓“六经注我”,就是说将古来的学问为我所用;“我注六经”,就是说将我的思想与观点注入传统学问之中,所以中国史科学或文献学的特点就在于如何应用这两句话中,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包含内容甚广,可以说囊括了中国所有学问。举例来说,中国哲学一直是以传统的形式而透露出新观念,学者研究都是在发古人之悠思,在祖述古人学问的基础上再创造出自己的学问。例如中国人一直认为“道”是中国哲学里面最高境界,每个朝代都有对“道”的不同解释,每个人对宇宙观和世界观都有新看法。中国古代的宗教学研究,也是运用这两种方法。

就目前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西方的方法论来进行宗教思想理论等方面的解构,亦即将宗教思想理论教义分解为多个科目,分别按照每个固定科目来进行阐述与研究。如在宗教哲学方面,将宗教的理论分为解脱论、道德论、修行论、目的论等等范畴,并从这些不同的范畴来解构宗教哲学。这些方法有助于对宗教思想给予定性,也利于与国际宗教学界接轨,益于对外交流。二是按照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进行研究,沿用历史上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方法,对传统宗教思想理论教义作更多的注疏性的讨论,这些方法有助于梳理历史发展轨迹,给予新解,但是不便于国际交流,往往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形成各说各话的现象。上述两种方法各有新意,也有缺陷。西方的解构方法是注重单体的研究,在整体中分理出个体再进行研究,虽然研究非常具体,但是缺少整体的把握。中国传统的注疏方法是注重历史的原意,在整体把握上提出自己的新意,但是缺少细致的论证,也不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学研究突飞猛进,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已是未来宗教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学者的任务也从简单照搬西方或沿用传统中国治学方法,转移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方面。未来的研究,需要我们在综合中西研究的方法论之后,建立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既包含了西方的解构式思维方式,同时又应有中国式的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方式,最终实现从点到面,面中有点,点点相连,面面俱到的特色的中国宗教研究方法。中国宗教学界只有在建立创新的方法论之后,才能在未来世界宗教研究中占据自己的地位,以中国学派的风貌屹立在世界学术之林。下面我们对近年来佛教研究方法论举例,并作一回顾。

二 2004“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

2004年11月12日至15日,“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中国佛教学者首次对佛教方法论做出讨论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以及台湾地区的佛教学者和法师一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丰富,富有新意。与会代表围绕“佛学研究方法论”、“佛教与佛学”和“佛教教育与佛教诠释学”三个主题做了认真的讨论。

(一) 佛学研究方法论

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佛学研究的两支队伍中,学界流行的主要是理性主义,教界盛行的则是信仰主义,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 将理性与信仰视为两个截然不同、彼此隔绝的范畴。即认为理性涉及现实,信仰关乎价值;理性的终极是客观世界,信仰的归宿是彼岸。理性与信仰互不相干,各有各的统辖。2. 将理性与信仰视为一对矛盾,两者存在着根本冲突。即认为理性是科学、进步的力量,信仰是历史遗留的愚昧残迹,随着科学的发展,信仰终将被理性取代。3. 认为理性与信仰虽然在侧重的领域、标准、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相融而非相斥的。但有法师认为,盲目信仰或无同情理解都不能看清佛教思想,只有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观察,同情理解,才能看清和把握佛教思想。

重文史、重研究、重撰述,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十分宝贵的优良传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迅速演变为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与这个传统是密切联系的。近现代的史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超出历史研究本身,从历史中接受经验教训,探索佛教发展的历史法则,从而把握佛教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能给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提供一些启示。

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不同,以及佛教与其他文化体系之间的不同,但佛教是非常圆融的宗教,以此为方法,做到佛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才能真正在现代社会中把佛教的精义发挥出来。佛学如果不透过实践的工夫,将永远发挥不了救世济民的效用,也达不到修行证果的目的。因此我们要用“以实践印证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两不偏废。现在从事佛学研究者应有使命感,要有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历史感觉,要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有人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应当采取的是客观的、理性的学术立场,研究的态度是汤用彤先生提出的“同情之默应”

之理解。佛法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佛法中蕴涵的哲学正是构成了佛教信仰体系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说,佛法就是哲学。对佛法的哲学研究,必须有“心性之体会”。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须注意的三个关系是:一,研究与体验的关系;二,研究与信仰的关系;三,研究与批判的关系。此外,还要具有问题意识、运用现代语言来诠释佛教哲学术语、概念和范畴,界定其意义,解说其思想,寻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比较研究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特色有着重要意义、探索中国佛教哲学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现代价值与意义。总之,运用多元方法,从多角度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将推进中国佛教哲学研究全面、深入开展,将产生丰硕的、可喜的创新成果。

有人提出,研究佛教,要跳出佛教本身,把佛教放在时代大背景中,放到时代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进行考察,也许就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有所损益。例如《坛经》不像传统佛教经典那样艰深晦涩,它的许多思想乃至名词、术语等,与其说来自于传统的佛教,毋宁说源自于传统的儒家学说。

也有人认为,研究南山律的弘法历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启示我们:一,适宜时事,这是佛教戒律兴盛的永恒主题;二,打破禁区,使戒律研究成为公众议题;三,运用多学科来做戒律研究。在研究律仪的问题上,我们是否能入世的精神成为研究出世的法则。此外,学者强调,佛教教理统计法对佛教经典或佛教现象有关的数据加以统计分析,能更加精确地把握其中内涵。

(二) 佛教与佛学

有学者指出,在近十几年的佛教学术会议上,教界与学界的“内在紧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不时“外在化”,相互之间“公开的争议”或转化为“公开的尊重”,以此来消解这种“内在的紧张”。但最根本的分歧是:教界人士往往强调佛学研究需要有“体验”,乃至要有“修行”,认为离开了“体验”与“修持”是不可能真正懂得“佛学”的。教界的“佛学”概念实际是“佛法”,即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佛教修学体系。佛学乃是对佛义理与修持的理论研究,即将佛法作为外在对象来进行客观研究。佛教历史、宗派、人物、经典翻译、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也归于“佛学研究”范围。佛法则是佛所说的“法”,是佛陀所宣示的言教,是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理论及如何证悟这一真相而达到解脱之境的“实践方法”。佛法的对象是宇宙人生,佛学的对象是佛法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佛法以觉悟宇宙人生为目标,佛学则明了“佛法理论”为目标,如冠以“研究”之名,则可以说,佛法“研究的是宇宙人生本身”,而佛学研究“是佛法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传统中尽可能重视佛学

的特殊性,对宗教的“经验基础”(禅悟体验)予以高度重视。研究宗教者即使不能去体验“宗教经验”,至少也应对“宗教经验”做出哪怕是比量的了知,否则其研究很难说“全面”、“充分”,更遑论“客观”了。事实上,关于佛教禅定经验的研究是现在佛学研究领域最为薄弱的一环,近年来比较繁荣的禅学研究,基本只是禅之哲学研究而已。

学者说,近代以来,在相关论述中,“佛学”至少有如下多层面的涵义。一,“佛学”即佛教,它只是佛教的别名,二者其实完全一致。持这一论点的往往是教内法师或强调“佛学”体证特点的学者,如太虚大师。在这一派论者里,“佛学”即是“学佛”,虽不排除对佛教义理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绝不能离开佛教的体证与实践。二,“佛学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或科学或研究活动,只因这一学术研究以佛教的历史、文化、哲学等现象为对象,故名之为‘佛学’”。持这种观念的人,大多是教外学者,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对佛教持一种批判态度,如胡适、陈垣、范文澜等人。在陈垣那里,“佛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佛教教义”或“佛学思想”;2.“佛教史”(佛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等);3.“佛教典籍”。三,“佛学”乃指佛教哲学或佛教“义学”。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为两类人,一类是自古以来僧传中的“义解门”僧侣或所谓的“学问僧”,另一类是研究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的学者。如杨文会、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佛学院时称“佛学”为“内学”,印顺的佛学,汤用彤的“佛学”,后来的傅伟勋等学者谈禅佛教时采用的“佛学”概念,内涵仍拟沿袭了汤先生的指向,可以说这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哲学或宗教哲学学者的立场。

严格地讲,“佛学”概念出现,乃是近代学术按西方学术分类标准划界的产物,即它只是一个学科名称,而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形式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是由于“佛学”也以释迦牟尼开创的经教作为研究对象,才使两者发生纠葛。佛教与佛学差异,首先表现为二者目的与宗旨不同。一般说来,佛学目标是通过科学研究,揭示佛教发展历史规律,探讨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其他宗教门类的关系,为现实和未来佛教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而佛教则主要是通过佛教徒(僧侣)的修行实践,自利利他,使人实现道德精神的超越。其次,因为佛学和佛教一属科学,一属宗教,故其实践方法亦各有不同。大致说来,佛学研究方法主要是逻辑思维,重在知解,属于“比量”;而佛教实践方法是依靠亲证,由直觉而悟入,离不开“现量”。再者,佛教与佛学差异,还表现在二者对同一佛教实践活动的立场与评价,佛教作为宗教,难免存在一些信徒独特体悟出的、并具有一定神秘性的宗教现象,如历代僧传中所记载的种种“感通”事迹等,而佛学则站在科学立场对此予以质疑,并多持否定态度。

应该说,佛教与佛学二者之间存在不同与差异,既是客观事实,也是事物

发展过程中各自不同特点的体现。只有认清佛教和佛学中各自特点和质的规定性,我们才不会将学术问题与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以科学方法和态度治佛学,以宗教方法和态度治佛教,对它们的发展才是最有利的。佛教之“教”与佛学之“学”,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最高真理——西方的“理念”或中国的“道”,实现在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超越。佛教和佛学二者思考与观照的对象是相同的,其内容也都离不开一个“佛”字,依靠言教以求道、传道,此又佛教与佛学之所同也。处理佛教与佛学的关系,应坚持如下基本原则:一,“中道”原则;二,厘清分属;三,平等原则;四、求同存异。

也有法师指出,中国佛教确实存在部分宗派的先天不足,仅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实修法门,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修学体系。在当代佛教弘扬中,还出现了学术化佛教及其潮流,这对佛教在文化界推广显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可是学术所能关注的,只是佛教作为文化的层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义理及其内证,并不是仅靠学术研究便能触及的,而作为住持佛法、荷担如来家业的僧伽,如果只关心学术层面的佛教,势必会失去僧伽的本色。

(三) 佛教教育与佛教诠释学

学者指出,格义是诠释学的基本要素和思维方式,没有格义,也就没有思想概念的历史发展。就中国文化环境论,格义是一个永远体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再诠释或再创造的过程。中国佛教之所以有八宗,禅门之所以有五家七宗,但从思想冲突与分衍来看,自始至终包含有一个接触、理解、创造的内容。就中国佛教言,其中思想创造是再诠释,再诠释如果是杠杆,其支点就是格义。中国佛教哲学家实实在在地走了一条“文本主义”与“民族文化性格”或者是“汉文字性格”的融合之路,中国大乘禅佛学的原创哲学家有三分之二属于隋唐、五代、两宋的禅学大师,而整理这部分哲学家的思想,尚须庞大的队伍来努力耕耘。法师学者指出,把诠释学和佛学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建立具有佛教特色的诠释理论体系和诠释方法,印顺的“以佛法来研究佛法”是以三法印作为佛教诠释学的准则,这是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但在佛教的经论中还有更多的诠释方法。傅伟勋则是在中西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基础上加以深刻而丰富的创建,而且还进行佛教思想现代化的诠释,所以“创造的诠释学”虽然重视方法论,但已经具有存有论的意义与内涵。周裕锴的中国古代阐释学视野下的“佛教阐释学”,则是总结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本有阐释方法,缺乏存有论的探讨与现代的创建。成中英的“本体的诠释学”对佛教的诠释尚处于开始阶段,最具系统而且最富有成果的佛教诠释学是赖贤宗的“佛教本体论诠释学”,其对佛教存有论、佛教知识论和佛教实践论的建构已经相当完善,使佛

教诠释学的应用方面初具规模。

三 2008年我国学者再次展开佛教研究方法论的讨论

2008年中国大陆的宗教学研究较前一年来说,有了明显进步,这主要反映在:一,认识问题的视野放宽了,对许多宗教问题都做出了新看法,尤其在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研究表现明显;二,媒体对宗教研究更加重视,一些媒体专门组织专栏,讨论有关宗教研究问题,让不同的声音发表出来;三,学者对现实性的问题更加重视了,特别是与当前一些宗教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发表看法,田野调查报告增多;四,一些过去研究薄弱的领域得到加强,特别是在民族宗教理论方面,有新的想法和文章出现,弥补过去不足。总的说来,我国大陆宗教研究正在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虽然发表文章的总数仍然与过去基本持平,但是在学术水平较过去有明显提高。然而,作为佛教来说,佛教研究的方法论的讨论则在这一年的佛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它不仅表现了学者在这方面撰写文章,做出深刻的探讨,而且还对当前中国佛教的研究现状多有评论,对我国佛教研究大有帮助,也是我国30年来佛教研究的反思。

佛教研究方法论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瓶颈,由于方法论使用没有突破性进展,中国佛教研究始终未能走出国门,因而影响了中国佛教研究与世界佛教研究的接轨。因之有人认为:“时至今日,虽然佛教学作为纯粹的学术方法仍未确实生根于汉语学界。”^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专门组织了佛教研究方法论专栏,约请专家畅谈有关方法论研究问题。该刊“编者按”指出: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之风,注重“内在理解”与“唯证乃知”的传统研究原则遭到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挑战和冲击,中国佛教研究方法因此呈现出了多元化局面,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固然丰富了佛教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传统与现代方法之间的张力,以及佛教研究者对于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界限,及各自的有效性,仍缺乏足够的清醒与自觉,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方法论的混乱与交流的困境。可以说,佛教言说的内在诠释之路在现代佛教研究中几乎被完全遮蔽、堵塞。原因在于,中国近百年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精神以及学术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渐渐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佛教研究者们渐渐放弃对佛教精神特质进行如实把握的诉求,陷入了二元对立的误区,对佛教研究要么是游离或者说外在性质的主观臆解,要么以西学的框架与范畴予以比附,他们呈现的“佛教”实际上早已是一种在现代性的“祛魅”魔镜中的异化之像,与佛教的本来面目相互乖离,虽然这种本来面目只是一种传统中显现,对其认同可能承担着不堪质

① 刘宇光《现代佛教研究概论》,《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3期。

疑的风险。

周贵华《佛学研究的内在诠释之一——以印度佛教瑜伽诂义思想为例》^①指出,在这种境况中,现今必须首先鼓励在佛教学术研究中对佛教进行深度或者说内在解读,以使佛教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在此方向上,探究与澄清佛教的诂义思想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在把握佛教诂义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佛教的内在诠释之路而建立佛教学术研究外在诠释之路,打破佛教研究中二者疏离的现状,使二者在不即不离的交织中形成紧张与和谐的关系,因此,当前佛教研究中的首要任务是厘清佛教诂义思想,把握佛教的内在或者说自我的诠释方式,以尝试建立佛教研究中的外在或者说他者诠释方式,由此才能逐渐消解百年来的累积与传统的隔绝感,从而通过佛教学术研究,既呈现佛教思想的精神特质与历史面貌,又能发扬佛教思想优秀精华。陈坚《护教学还是宗教学:汉语佛教研究方法的再反思》^②,反思近代以来的汉语佛教研究,认为我们发现汉语佛教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徘徊于护教学与宗教学之间,护教学的研究和宗教学的研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相混乱,被印顺法师形容为是“东倒西歪,非驴非马”,从而导致了这两种范式的研究都得不到纯正而深入发展,影响汉语佛教研究的整体推进,相比之下,西方学界的基督宗教研究则能保持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平衡发展。李向平《“社会理性”:佛教研究的新视角——从对马克斯·韦伯的误解说起》^③,提出佛教信仰体系所具有的灵性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建构为一种社会交往平台,以一种社会资本的规范、信任、互动的形式,来表达人们之间的相互关怀和社会自理,这一点应当是佛教理性化,或者是重建佛教理性的基本出发点。所以,佛教理性化的关键问题,即是佛教信徒的社会交往关系的重建,佛教信仰共同体信任方式的重建,价值观念的共享及其地方社会的再度认同。因此,佛教理性化的范式、特征和向度,将决定中国人间佛教的演变方向和社会的特质,决定中国佛学界研究范式的一大变迁。张伟然《历史学家缺席的中国佛教研究》^④,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逐渐加入到佛学研究行列,通过史学家和哲学家深度交流与合作,逐渐开创出中国佛学研究的新局面。史学家进入,至少在两个方面会让当前的局面有所改观,一方面,虽然中国的佛教史研究目前已深入到开展宗派史、地方史研究阶段,但对基本史实、基本发展线索的爬梳,还处在相当粗疏的阶段。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都没有梳理清楚,遑论一些

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以往认为并不十分重要,而实际上却发生了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些工作,如果交给史学家完成,凭他们对史料的把握,应该不难取得较好效果,这不仅可以节省哲学家们大量精力,还能为哲学研究工作提供更多客观依据。另一方面,史学工作的独特视角,可以为佛教史研究发现一些新问题。例如,以往对中国佛教宗派研究,大多只注意到佛教宗派成立原因和标准,已经有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很好意见。可是,在从事佛教地理研究的过程发现,那样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同地域的宗派,其组织形态差异非常大,不仅不同宗派之间,就在同一宗派内,其地域差异都断断不可忽视。不妨说,有些宗派内部的地域差异已经超过了某些地域不同的宗派差异,几乎难以一概而论。这些内容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关于中国佛教宗派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接近历史实态。唐忠毛《“学”、“证”之间——近代以来佛教研究方法的困境及其反思》^①,回顾近代以来的种种佛教研究方法之争,强调由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和学术化方法带来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远没有化解和消失,甚至就当前的佛教研究现状而言,这种冲突而致的方法论混乱也还有增无减。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点:其一,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西化”理性思维与学术化训练,逐渐淡忘了自己的传统佛学研究方法,或者说对自身的传统方法渐渐失去了自信。可是另一个方面,我们真正建立起成熟的佛教研究现代传统,在方法上常常陷入一种“不中不西”的局面。其二,研究者对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界限及各自的合法性仍缺乏足够的清醒自觉,在研究方法上常常厚此薄彼,从而导致佛教学研究与交流对话的困境。其三,有些研究者对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虽有所自觉,并隐约想建立一种新的佛教研究范式,但基本上却仍停留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况。因此,在这种分裂中,不同的解说方式也代表了不同致思理路和思想目标,来自西方客观中立的立场,丰富了佛教研究相关成果,扩大了佛教研究视野。但作为传统,中国佛学精神的独特性格毕竟是在其传统中形成的,一个完全丧失了传统方法的中国佛教研究是否还能保持其自身品格,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的体证方法、个人的修学体验,虽不足以形成系统化之方法学理论,但是对于学术化研究结论来说,也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就历史文献学、诠释学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大陆研究状况一直落后于日本、欧美和港台,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对文献学、外在的诠释方法的轻视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只有承认不同研究方法的合法性,并对其界限保持清醒的自觉,才能真正丰富佛学研究的成果。为此,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佛学研究虽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种固定的研究方法;二,

^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应当承认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目标,这样不仅有助于某一研究领域的丰富与发展,同样也有助于提高佛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三,应该清楚意识到不同研究方法自身的有效性范围和局限性,不能尊己卑他,以偏概全,更不可仅以某一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为“真理性”结论。保持对不同的研究方法界限及其合法性的清醒认识,可以让不同方法的喜好者在各自领域里耕耘,相安无事,各自发展,不妄自菲薄,也不尊己卑他。这确是当前佛教研究方法论应该提倡的局面。但建立这个新传统的一些思路也许在于“返本开新”,所谓“返本”,是指新传统(新范式)的确立应该对于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有清醒地了解,并恢复对传统方法的自信与自觉,不确立西方学统的权威地位,并充分正视佛学内在诠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谓的“开新”,是指新传统(新范式)的建立不可能完全回归传统本身,或者回到内学院式的解经方式,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古、今、中、西”的背景下进行,因为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代视野。因此,这种“返本开新”的整合思路,要求研究者既要从佛学整体精神出发,也应当兼顾学术与体证、教内与教外的辩证统一,还要自觉到佛教在现代发展不能是固步自封地自说自话,还应有其世界文化的视野。

刘宇光发表《现代佛教研究概论》^①,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作了另一种“国际化”的解释。作者说,民国的佛学研究是佛教认信者站在佛教信仰立场上所展开的、信仰式的研究,乃服务于宗教实践及宗教组织、宗教社群的成长与发展,一般可称为“教团佛学”、“僧团佛学”,甚或经院佛学式的研究。“学院佛教研究在态度上的最大特性是站在局外人或不是认信者的立场的展开研究”,而“现阶段国内的佛学研究不单从未因自视佛教为中国文化一环而占任何研究上的优势,反而是这种错置而造成国内佛教与国际学界相当脱节”。作者回顾了欧美学术界与日本佛学界研究的情况,认为西方的史语法与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死学问,不能展开研究。日本吸收了欧洲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其佛教研究“中立、客观”的价值判断。战后美国的佛教研究推崇“参与的观察者”方式,使研究成果变成了跨传统诠释,发展了佛教研究,所以“英语学界佛教研究范围之广,题材多样之高,不同研究模式并存,都可以说明在以后一段时期内,英语学界在现代佛教研究上富开创性的角色会益形重要及更有主导力”。对中国佛教研究,作者认为:“把汉传或东亚佛学视作‘中国哲学’儒、道、释‘三教’架构内的一员,普遍见于使用汉语书写的中国哲学界的佛教研究。这一般被称为‘中国佛学’的范畴包含特定的研究模式。虽然它在当代国际佛学界并非典型,但在华人学界中却是主流类型,尤其常见于中国哲学视野下的佛学

① 《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3期。

研究,然而对于这种研究模式的内在预设却罕受学界检讨与注意。此一架构不管在思想方式及文化国族主义(Cultural-Nationalism)上都有其特殊的预设,既为汉传或东亚佛学的研究带来一定困囿,不单有碍对东亚佛学的缺点进行批判性省思,同时也反过来间接加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某些不无可议之处的既定角度。”作者特别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阶段长达三十多年,其后遗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被解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对于过去三十年国际佛教研究所形成的长足进步非常陌生,无法与国际的研究接轨与交流;(2)这种脱轨的现状难于在短期内大幅改善,其因由并不只是信息的缺乏或分隔,更多是源自一种迄今仍旧普遍见于内地佛教研究学人的心态,即视佛教为中国文化的一员,因而外国人没有理由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的错误假定。事实上以梵、巴、藏、汉四个依语种区分的佛教传统中,即使是汉传佛教也都已经超出中国文化范围以外,而涵盖日、韩及越南,更不要说其他。在此一错误假定下,造成不良后果之一是中国内地在梵、巴、日的佛教研究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远远落后于欧美。由于视佛教只中国文化一员,从而欠缺对其他古典佛教语种的研究与训练,加剧了与国际学界的距离。因此,中国内地佛教研究现阶段急需的是重新建立与国际学界的学术合作及交往关系,从中吸收外界的现有成果。……中国当前的佛教研究正处于逐渐重建常态规范的阶段,除内地同仁的努力外,参考国外经验,尤其加强发展与其他华人地区佛教研究同仁的合作将有助于研究事业的进展”。

宋道发《中国佛教史观研究导论》^①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了评论。他认为历史上“佛教史之所以不受传统史家的重视,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自东汉以降,历代修史,皆以儒家思想为价值标准,故释、老两家皆不受重视;二,传统史家皆有夷夏之分的民族意识,佛教被视为夷狄之教而备受排斥;三,官修史书的基本史料,来源于历朝的官方文书,其中佛教方面的资料很少,且纵有佛教资料可资采用,传统史家或对之不屑一顾,或因不谙佛教而无从措手”。而对今天的佛教史研究的局面,作者又指出:“一是研究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学者,多关注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等史学理论的研究,由于基本立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知识背景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佛教史观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二是研究佛教史观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养,既要深谙佛教教理,又要熟稔佛教史籍。佛教学者之中,擅长教理者往往不谙史传,穷研史传者大多不通教理,故而在佛教史观的研究上,始终难以有所作为。”作者强调,“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诚然有其必要,但并非佛教史学研究的最佳路

①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

径。……就佛学研究方法而论,笔者赞成太虚大师倡导的,同时也是佛教长久以来视为根本的‘解行相应’法”。

李正宇《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①,回顾敦煌佛教研究的整个过程,认为可以发现以往学者多是按照规范进行描摹,塑造出一个理想型的敦煌佛教。少数敦煌学家近年来虽已指出吐蕃统治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颇有不合经、戒的世俗化倾向,但仍未能对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的特性做出明确的判断。实际上,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不仅仅是具有世俗化的倾向,而是已经变成与佛教规范背道而驰的世俗佛教,体现出一些较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此有必要重新改写以往出版的中国佛教史及敦煌佛教史。作者强调,中外佛学家撰写的《中国佛教史》所描绘的那种合《经》合《戒》、超世脱俗的理想型佛教,至少从隋唐以来已不存在。隋唐以来的我国佛教,无不是程度不同的入世合俗的世俗化佛教,以往那种用《经》、《戒》规范当模具铸造出来的所谓“中国佛教”,其实是脱离实际的,与中国佛寺实际情况、与僧侣及广大信众信行实践都相去甚远。作为中国佛教史,不顾中国佛教寺、僧侣及广大信众的信行实践,只按照佛学义理的匡范加以取舍,用模具铸造出的所谓“中国佛教史”,并非真实存在,不能令人信服。佛学史或正统佛学思想发展史虽然与佛教史有相当的关系,却并不等于佛教史,更不能用来取代活生生的中国佛教史。

四 对佛教研究方法论之我见

佛教研究的方法论在短短的4年内引起了如此众多的人来关注,这不是偶然的,它应是近30年我国佛教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我国的佛教研究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未来的佛教研究应该如何走下去,特别是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背景下,大国中国的佛教研究也要伴随着大国的地位而走向世界佛教研究论坛。在这个背景下,佛教研究的方法在过去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只要自说自话就可以了,其讨论也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圈子内就可以完成。但是随着佛教界和佛学界国际交往的增多,与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正在发生碰撞,以往的自说自话式的研究肯定已经不适应中国学者的要求,如果中国佛教研究要走向世界,取得话语权,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因此方法论成为学术研究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个瓶颈之后,中国的佛学研究才能走向世界。

重文史、重研究、重撰述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十分宝贵的优良传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迅速演变为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与这个传统是密切联系一起的。近现代的史论相结合的研究方

^①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法,超出历史研究本身,从历史中接受经验教训,探索佛教发展的历史法则,从而把握佛教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还是能给我们进行研究时有一些启示的。以上所有的学者的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全局上来看,既不全面,也有偏颇。中国佛教研究要走向世界,方法论的使用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佛教的研究资源独特,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所以才会引起外国学术界的注意,对此加以研究。

世界佛教研究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对佛教的研究最早是从研究印度宗教思想文化传统开始的,以后才扩展到中国汉藏两大系统的佛教。佛教最早被西方学者注意,予以研究,是因为西方列强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开始研究佛教的人并不是学者,而是在殖民政府担任公职的一些官员。以后,这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欧洲之后,于是才有学者介入,并且作为一种学问进入了学者案头。其次,西方学者囿于研究条件,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基础工作,而这种基础的工作就是文本研究,从史语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切入,由此形成了西方学术风格,但是随着研究深入,文本的研究不足以表达一种完整的学问时,作为文化的背景及其与之有关的历史研究等开始进入学者视野,所以西方学者的研究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形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西方人不懂东方人文化,只好在语言学方面做一些基础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史语法的研究成为死胡同的原因,也是后来佛教诠释学发展的最重要动因。

中国佛教研究,自古以来已有之。传统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一直是中国佛教研究的最基本方法。研究佛教的目的,一是要对教义理论进行提升,二是对佛教的思想予以总结,三是忠实记载佛教的历史与人物的贡献,四是要提高本宗本派的地位。所谓的“内在理路”,或是“护教学”,还是“返本开新”、“解行相应”等无一不是围绕这些目的而服务的,这些目的至今仍然是不同立场佛教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引入我国,按照西方学术研究的路数来研究佛教,使学者们在模仿与创新之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早期的中国学者主要是按照西方的学术概念对佛教的基本理论与概念进行解构,这一时期所谓的创新,就是佛教研究的西方学术化。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者在掌握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之后,开始有了创新性诠释与理解,出现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成果由于没有脱离西方治学方法的樊篱,因此也不能产生影响,相反的倒是仍然用传统方式来研究佛教的著作,反而成为世界学术名著,像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一书,并没有因其缺少西方研究的路数而不受人重视,反而获得了各国学者普遍好评。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一书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学术名著,是在于它的翔实资料和细密考证,以及旁征博引的内容,所谓的方法论是没有什么必然